

《1858年伦敦酷暑》：微观史学视域下的文学史

乔修峰

内容提要 英国学者罗斯玛丽·阿什顿长年从事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研究，撰写了多部作家传记和思想史著作，近年来转向微观史学研究。她的新著《1858年伦敦酷暑》用四个月的时间跨度，描述了狄更斯等作家生平创作中常被忽略的方面，呈现了次要作家、作品或文类在当时文学生态中的重要性，深入挖掘了文学、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联，非但没有使文学与历史“碎片化”，还使微观视域下的文学史具有了“陌生化”的效果。

关键词 微观史学 罗斯玛丽·阿什顿 英国文学 维多利亚时代 狄更斯

“微观史学”（Microhistory）并非一个统一的学派，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的一种研究趋势。相比宏观研究，它更关注“个别的、具体的事实，一个或几个事实，地方性事件”，通过研究微观现象发现或折射出其他方面的现象。^①长期从事十九世纪英国文学研究的罗斯玛丽·阿什顿（Rosemary Ashton）2017年出版了微观史著作《1858年伦敦酷暑：狄更斯、达尔文、迪斯累里与大恶臭》（*One Hot Summer: Dickens, Darwin, Disraeli and the Great Stink of 1858*），回溯了当时的文学、科学和政治状况，详细分析了狄更斯等作家在短时期内的生平创作，描绘了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从“中心”到“边缘”的多种生态，尝试寻找文学与社会、思想之间的隐含关系，并以社会史和思想史为背景，呈现了微观视域下的文学史。

一、阿什顿的微观史学研究

罗斯玛丽·阿什顿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英语语言文学教授、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撰写了多部十九世纪英国作家传记和思想史著作，为她后来的微观史写作奠定了基础。她早年关注德国思想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德国思想》（*The German Idea*, 1980）分析了德国思想对十九世纪四位英国作家的影响，

^① 陈启能《略论微观史学》，载《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第22、24页。

《小德意志》(*Little Germany*, 1986)则讨论了流亡英国的德国人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认识。她对乔治·艾略特研究颇为深入,还撰写了多部人物传记,传主大多与德国文学和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1983年,她写了《乔治·艾略特传略》(*George Eliot*),后来又出版了《乔治·亨利·刘易斯传》(*G.H.Lewes*, 1991)、《柯尔律治评传》(*The Life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996)和更为详尽的《乔治·艾略特传》(*George Eliot: A Life*, 1997)。她的《卡莱尔夫妇的婚姻》(2002)已经有了微观史学的影子,以文坛泰斗托马斯·卡莱尔的婚姻生活为切入点,再现维多利亚时代关于女权、婚姻和法律问题的争论,反映当时的“文学、思想和社会”^①,将文学史与思想史、社会史结合了起来。

2000年后,阿什顿的研究转向了微观视角,虽然仍以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和思想界的人物为主,但更侧重他们的日常生活,寻找与他们相关的次要人物,空间上聚焦于一栋建筑、一个街区或一座城市,时间则限定在较短的时段,有时甚至只有几个月。由于大量使用人物传记资料,其微观史学著作叙事生动,故事性很强。《斯特兰德大街142号》(*142 Strand*, 2006)以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一栋建筑为中心,讲述了出版商约翰·查普曼的事业与交往,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激进思想氛围,起到了滴水见世界的效果。《维多利亚时代的布鲁姆斯伯里》(*Victorian Bloomsbury*, 2012)则将视角从伦敦的一栋建筑扩大到一个街区,由此审视十九世纪英国的教育、医疗和社会改革。2017年的新著《1858年伦敦酷暑》又把视野扩大到整个城市,但时间跨度只有短短的四个月,以伦敦史上罕见的高温和“大恶臭”这个地方性事件为线索,以文学、科学和政治领域的三位杰出人物为中心,描绘了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组人物群像,探讨了维多利亚时代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关联。

微观史学的代表作,如卡罗·金斯堡的《奶酪与蛆虫》(1976)、埃玛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1975)和纳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1983),都是写小地方的底层小人物,描述他们的生活习俗和精神世界。阿什顿的微观史学著作虽然也聚焦在较小的地理区域,却是在伦敦这个大都市,并以知名人士为主线,追溯他们生平事业中的细节,探寻与之关联密切的边缘人物,挖掘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之间的隐含关系。她认为:“微观史学就是要细致深入地研究历史现象,挖掘未知的关联、模式和结构。”^②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现代小说》一文中提出,

① Rosemary Ashton, *Thomas & Jane Carlyle: Portrait of a Marriage*, London: Chatto & Windus, 2002, p. 7.

② Rosemary Ashton, *One Hot Summer: Dickens, Darwin, Disraeli and the Great Stink of 1858*,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小说要“纪录微尘坠落心田的过程”，“描述每一事每一景给意识留下的痕迹，哪怕看上去毫不相干、互不相连”（*One*: 6）。阿什顿认为微观史学也有这种魅力，可以将看似不相干的人物、事件和观念联系起来。这也是她微观史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和特色。

《1858年伦敦酷暑》的微观视域主要体现在时间跨度很短，讲述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在1858年5月至8月这四个月中经历的危机时刻。阿什顿认为，“长篇传记和宏观史书要么讲述人物一生，要么叙述整段历史，无暇挖掘芸芸众生在那个夏天所经历的种种紧张时刻”，而“选取一个比较短的时段，进行深入考察，能够发现很多相通、交叉或重合的路径，也能看到一些有意为之或纯属偶然的关联”（*One*: 6）。该书不仅详细描述了狄更斯、迪斯累里和达尔文生平事业中长期被学界忽略的层面，还探讨了他们与萨克雷和乔治·艾略特等小说家、德比勋爵和维多利亚女王等政界要人、布鲁内尔和巴泽尔杰特等工程师、威廉·弗里斯和奥古斯塔斯·埃格等画家以及众多律师、医生、记者、博物学家之间的关联，就像波德莱尔所说的“现代生活画家”那样，捕捉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和文化中很多稍纵即逝的瞬间和隐含的联系。卡罗·金兹堡认为，微观史学并没有忽略宏观层面，微观史与宏观史之间、特写镜头与远镜头之间要不断地转换。^①《1858年伦敦酷暑》也不断切换镜头，将这年夏天与十九世纪英国的政治、婚姻和医疗改革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本文将以书中谈到的狄更斯和一系列相关人物、事件为例，探讨阿什顿的微观史学研究给文学史带来的新视域。

二、微观史学视域下的狄更斯

微观视角可以详细考察一个作家在短时期内的生活与创作，通过挖掘被忽略了细节和隐含的关联，展示作家的不同侧面，甚至颠覆其传统形象。狄更斯是十九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他的情感生活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但长期未能引起学界重视。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很多传记作家和研究者开始关注狄更斯的婚姻问题，克莱尔·托马林（Claire Tomalin）的《隐身的女人》（1990）和《狄更斯传》（2011）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但没有详述狄更斯在1858年6月公开宣布与妻子分居后，怎样熬过

^① 卡罗·金兹堡《微观史学：我所知道的二三事》，李映雪译，载陈恒、王刘纯主编《新史学》第十八辑，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80页。

了那个漫长的夏季，这对他的创作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①《1858年伦敦酷暑》补充了这方面的细节，并借助狄更斯的亲朋好友、观察者、评论者和竞争者对他的评价，看到了狄更斯的另一面以及这段情感纠葛对他后期小说情节和主题的影响。

对狄更斯来说，1858年夏天是个不堪回首的夏天。四十六岁的他虽然已经功成名就，却进入了创作的枯水期。这一年，他没有写出任何长篇或短篇小说，甚至没有动笔创作。他从1833年开始创作，几乎是头一次出现这种状况。1858年初，他还对好友约翰·福斯特说，希望夏天能收回心来，开始创作。但到了夏天，他又与结婚二十二年、为他生了九个孩子的凯瑟琳·霍加斯分居，还在报上公开发表了分居声明，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美国和欧洲大陆。阿什顿描述了这件事的经过和前因后果，是目前最详细的版本，如她所说，几乎是一份“一天接一天”（day-to-day）的记录（*One: 7*）。阿什顿的描述带有明显的情感立场，她同情狄更斯，但更同情被狄更斯伤害了的人。

1858年5月，关于狄更斯的婚姻问题，已经有不少风言风语。伦敦的俱乐部、德比马赛的赛马场和廉价报刊都在传他的绯闻，有的说他跟妻妹乔治娜·霍加斯眉目传情，有的说他跟年轻的女演员朝云暮雨。6月，狄更斯在《泰晤士报》和他自己创办的《家常话》上发表分居声明，为自己辩解，说“这些传言严重不实，极端荒谬，也极其残忍，不仅伤害了我，还殃及一些无辜之人，其中有我至亲至爱的人，也有与我素不相识的人（如果真有其人的话）”。阿什顿认为，这份声明非但没能平息谣言，反而引来了更多的关注，因为他只说传言不实，却又不说传言的内容，也没有说那些无辜之人都有谁、是谁杜撰了那些与他素不相识的人，导致很多读者都想知道传言是怎么说的、无辜的人有哪些。阿什顿委婉地指出，狄更斯在这份声明中表现得有些虚伪：“他明明很不诚实，却坚持说自己很诚实。”（*One: 96-97*）

狄更斯的虚伪还在于他说分居是因为与妻子性格不合，但其实主要原因是他已经感情出轨。1857年夏天，他在排演戏剧《冰封深海》时，爱上了十八岁的女演员埃伦·特南，9月便跑到英格兰北部与埃伦幽会，12月又在信中描述见不到埃伦的沮丧心情：“我希望生在一个有吃人妖的时代，巨龙把守着他的城堡。我希望，长了七个头却没有大脑的吃人妖掠走我心爱的公主——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爱她——把她关到群山之巅的城堡中，用头发捆住她。我今天就想拿起宝剑，爬上高山，救出公主。如果不成，就血溅当场。这就是我在1857年的心情。”“心爱的公主”让他躁动不安，一

^① 托马林的《狄更斯传》有五百页左右，却只用了十多页谈狄更斯在1858年经历的“风云激荡”（*Stormy Weather*）。参见 Claire Tomalin, *Charles Dickens*, London: Penguin, 2011, pp. 289-304.

直到1858年5月都“没法写作，没法休息”，“从来没有人被一个精灵控制并撕裂成这样”（*One*: 56-57）。6月，他逼着凯瑟琳在分居协议上签了字，但一直对外宣称是因为与凯瑟琳性格不合才分居的。他对好友安杰拉·伯德特-库茨说，他和妻子“彼此完全没有兴趣，没有同情，没有信任，没有感情，更谈不上情投意合”；也对好友约翰·福斯特说，结婚两年后就发现与妻子“根本合不来，毫无希望”。阿什顿认为这是自欺欺人，只有他自己相信他的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幸福，因为这样能让他的良心好受些（*One*: 53, 55-56）。当时文学界的很多知情者都对狄更斯的做法表示不满。诗人勃朗宁夫人愤怒地说：“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才说性情不合？这算什么借口！我觉得还不如说用情不专呢。”萨克雷也说，狄更斯夫人“做了二十二年的主妇”，生了九个孩子，没犯什么错，“却要被扫地出门”（*One*: 217, 100）。

狄更斯不仅公开发表了一份毫无诚意的分居声明，还在5月底给阿瑟·史密斯写过一封信，谈了自己婚姻问题的“真相”，说夫妻二人琴瑟失调“已有多年”，“从来没有一对夫妻，双方都没有不良习气，却无法相互理解，没有共同语言”。8月中旬，这封信在美国见报，英国报纸纷纷转载。狄更斯称之为“被泄露的信”（the Violated Letter），但阿什顿暗示，狄更斯写信时就已经授权给史密斯，“允许”他拿给“任何想还我公道的人，或因不明真相而冤枉了我的人”看，并非被泄露了的私人信件（*One*: 214）。勃朗宁夫人甚至认为，狄更斯就是想公开这封信，拿才华当“棍棒”来对付妻子，“利用人们对他的崇拜，煽动舆论来反对她”。最先发表这封信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也认为，狄更斯的妻子一直默不做声，他却咄咄逼人，接二连三地发表声明，自然不得人心（*One*: 216-217）。

阿什顿认为，狄更斯在整个分居事件中太过自私和虚伪，不仅不敢承认自己用情不专，还只顾维护自己的形象，丝毫不顾及凯瑟琳的感受，心胸狭隘，言语刻薄。她引用凯瑟琳亲友的话说，公众把狄更斯“奉若神明”，但他的“柔情和慈悲”都只是“童话故事”。狄更斯的弟弟弗雷德也说他言辞刻薄，心肠太硬：“人们读你的书，还以为你是世上最宽容大度的人。可要是让他们也受你监管，就凭你对亲人的态度，我得说，上帝保佑他们！”（*One*: 218, 213）同为女性学者的克莱尔·托马林也在《狄更斯传》中说，狄更斯感情出轨后，想表现得像个“单纯的男孩”，反倒暴露了“性格中最阴暗的部分”。^①阿什顿还暗示，乔治·艾略特在情感生活上就很有担当，在与有妇之夫乔治·亨利·刘易斯坠入爱河后，能够顶着巨大的压力，与意中

^① Claire Tomalin, *Charles Dickens*, p. 292.

人长相厮守，不像狄更斯这样遮遮掩掩，不敢与埃伦公开露面。她认为1858年夏天的这段经历让狄更斯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他后来创作《远大前程》（1860）和《我们共同的朋友》（1864—1865），就是在探讨罪与耻的主题，尤其是《远大前程》，堪称他最伟大的小说，描写年轻的主人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痛悔前非，忍受着良心的煎熬（*One*: 3, 248, 285-286）。阿什顿的分析虽然言之有据，但过于鲜明的立场也削弱了论证的力量。关于狄更斯的情感波折对其创作的影响，显然还有商榷的余地。除了忏悔，小说中的这些人物依然真诚、善良、宽厚、乐观。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报刊税的取消，涌现出了大量的廉价报刊（penny papers），它们的“一周闲谈”“俱乐部闲人”等栏目都擅长散布小道消息，既推动了当时对名人的崇拜，也影响了这些名人的行动。近年来，这些原始的报刊资料很多都实现了数字化，为深入研究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日常生活提供了庞大的数据库。《1858年伦敦酷暑》就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料，回顾了“日报、周报、晚报、半月刊、月刊和一便士一份的廉价报纸”（*One*: 95）对狄更斯分居事件的看法。这恰恰是此前研究比较薄弱的地方。弗雷德·卡普兰的《狄更斯传》用的主要是狄更斯等人的书信，彼得·阿克罗伊德的《狄更斯传》虽然提到了英国媒体的报道，但没有具体说有那些报刊、它们是怎样评价狄更斯的、又对狄更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①阿什顿则用大量例子证明，媒体在这件事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剧了狄更斯的担忧和恐慌，影响了他的判断和行动。一直令狄更斯耿耿于怀的《雷诺兹报》（*Reynolds's Newspaper*）就刊登了一首讽刺诗：“若论用舌头和笔头胡说八道，没人能干得过狄更斯；/但现在他也没法拿道德说事了，/因为从今往后，人们评判他的品行时，/不再依据他的《家常话》，而是依据他的家务事。”（*One*: 112）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难怪狄更斯竭力要控制媒体的报道。

三、微观视域下文学与社会的关联

《1858年伦敦酷暑》还把狄更斯的情感纠葛放到了公共生活背景中，与离婚法改革、精神病问题和女权运动联系起来。1858年1月1日，几经周折才得以出台的新《离婚法》开始生效，5月审结了第一批适用新法的离婚案件，媒体纷纷予以报道。霍加斯家威胁说要到离婚法院告狄更斯与人通奸，双方的代理人 and 律师通信十分频繁，

^① Fred Kaplan, *Dickens: A Biography*,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85-396; 阿克罗伊德《狄更斯传》，包玉苗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3-294页。

令狄更斯在6月初非常恐慌，不仅担心绯闻会影响自己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还担心会在离婚法庭上出丑。

狄更斯多次批判旧离婚法荒谬，却没想到新法反而差点让他出丑。在新法出台前，离婚要走三道程序，非常繁琐，而且耗时费钱，绝大多数人都只能望而兴叹。申请人先要到宗教法庭获准“分居”（*divorce a mensa et thoro*），法律上保留夫妻关系，不能再婚；然后再到法庭上，当着陪审团的面，证明对方与人通奸，要求赔偿；最后还要议会通过一个法案，宣布这桩婚事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允许解除婚姻关系，从而“彻底离婚”（*full divorce*），然后才可以再婚。很少有人能走完所有程序，女性更加困难。1800年至1850年，平均每年只有两人能“彻底离婚”；而1856年的议会上院辩论记录表明，在之前的一百五十年里，只有四位妇女获准离婚。狄更斯多次在小说中讽刺旧离婚法，1856年10月还在《家常话》上说：“按现行的离婚法，只要建立了婚姻关系，就再也逃脱不掉，解除不了，除非能够证明有某些特殊情况并支付一大笔钱。不拿出一大笔钱，就是暴行、酗酒、逃跑、重罪和疯癫，也无法解除这层关系。”（*One*: 29-31）新《离婚法》显然是司法改革的一大进步，使穷人和女性也有了离婚的自由。

不过，新法出台后，仍有很多人无法离婚。狄更斯的朋友爱德华·布尔沃·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和他妻子罗西娜就属于这种情况。两人感情早已破裂，1836年开始分居，从此势不两立，但两人行为都不检点，谁也不敢到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两人都是小说家，在当时也小有名气。布尔沃写过昙花一现的“银餐叉派”（*silver-fork school*）小说，描写贵族的浪漫传奇。1828年，他出版了畅销小说《佩勒姆，或一位绅士的历险》，主人公是个贵族公子哥，喜欢穿黑衣赴宴。很快，黑色的“无尾礼服”就成了当时流行的男子晚礼服。托马斯·卡莱尔对此非常不满，在《旧衣新裁》（1833）中批判了布尔沃笔下那些没有责任心和同情心的贵族。1858年夏天，布尔沃准备重新竞选议员，以便进入内阁担任殖民大臣。罗西娜伺机报复，督促出版商赶在5月底出版她的三卷本小说《世界与他的妻子，或一个重要人物》，因为她在这部小说中讽刺了她丈夫。6月，她又赶到布尔沃的竞选演说现场，向听众讲述布尔沃的斑斑劣迹，吓得布尔沃狼狈而逃。随后，布尔沃买通医生，开具了精神病证明，把罗西娜关进了精神病院，制造了1858年夏天的轰动新闻，也使人们更加关注婚姻矛盾和精神病之间的关联。

阿什顿指出，借精神病之名恶意囚禁他人的情况在当时非常多见，很多离婚案件都与此有关，也影响了文学创作。丈夫如果嫌弃妻子，可以诬陷她有精神病，贿赂

两名医生，让他们开具医学证明，把她关进精神病院。当时有很多报道说，无耻的丈夫贿赂无良的医生，把“病人”关进黑心的私营精神病院。在伦敦流亡的马克思也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文章《布尔沃·利顿夫人遭囚禁》，从这个个案想到了普遍的问题：“会不会有无耻之人，打着《精神病人法》的幌子，以诱人的价格收买两个贪得无厌的医师，从而拿到‘逮捕令’？”（*One*: 174）小说家威尔基·科林斯还利用这个题材创作了《白衣女人》（1859），写恶毒的珀西瓦尔·葛雷德爵士为了霸占妻子财产，把她关进了精神病院。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最初写《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就是在文学作品中读到了大量的关于“疯癫、囚禁”的意象。^①阿什顿则证明，这个问题不仅涉及文学意象和女性创作，还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文学界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布尔沃以精神病为由将妻子囚禁了起来，狄更斯也暗示凯瑟琳有精神病，“想让凯瑟琳的医生出具报告，但医生严词拒绝了，说狄更斯夫人的精神没有任何问题”（*One*: 217）。阿什顿还将婚姻话题放到了十九世纪女权运动的背景中。除了罗西娜的抗争和媒体的声援，卡罗琳·诺顿（Caroline Norton）也在为此奔走呼吁，写自传体小说，游说政界人士，1855年出版了小册子《就大法官克兰沃斯的“婚姻与离婚法案”致女王书》，为女性争取离婚和分居时的财产权。《1858年伦敦酷暑》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例证，在微观史与宏观史之间反复转换，寻找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联。

四、微观史学视域下的文学史

阿什顿熟稔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史和思想史，《1858年伦敦酷暑》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史维度，提供了一种时间跨度很小的微观研究，非但没有将文学和历史碎片化，反而借助特写镜头放大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联，通过一个切面呈现了人物、思想、事件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网，使读者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生态有了一种立体的感知。

首先，这种微观研究可以看到作家在一定时期内的详细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他创作的影响，发现一些一直未能引起重视的关联。《1858年伦敦酷暑》分析了狄更斯的戏剧爱好对《双城记》（1859）的人物和情节的影响、与他感情出轨的关系，指出了

^① Sandra M. Gilbert, "Conversions of the Mind", in Annette R. Federico ed., *Gilbert & Gubar's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after Thirty Years*, Columbia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p. x.

这段情感纠葛对他后期小说中忏悔主题的影响，揭露了狄更斯在性格和情感上不太光彩的一面。这些解读有助于开拓视野，启发思考，但也不应忽略史学家本人的态度和立场。

其次，微观视域有助于填补经典作家之间的空白，看到现在常被忽略的一些次要作家、作品或文类在当时的重要性。很多不知名或当时很有名但现在已被遗忘的作家，如爱德华·布尔沃·利顿的妻子罗西娜，不仅文采斐然，还与婚姻、精神病、女权运动等热点话题关联密切，也是时代画卷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微观视域也有助于挖掘文学与社会之间的隐含关系，在很多貌似不相干的话题之间找到关联。方兴未艾的街头小报对狄更斯和萨克雷的心理、行动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风靡一时的圈环裙（crinoline）时尚也影响了盖斯凯尔夫人的短篇小说《克兰福德的鸟笼》（“The Cage at Cranford”）；乔治·艾略特的小说《亚当·比德》“戏剧性、象征性地再现日常生活”（*One*: 38），与当时的绘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受到了时代文化氛围的影响。

评论家安妮·萨默塞特认为，阿什顿的这部著作虽然是微观史，却呈现了社会全貌，就像威廉·弗里斯的名画《德比赛马日》（1858），虽然只画了一天中的一个事件，却再现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而且各有特征，并不雷同。^①当然，阿什顿的微观史学研究不可能包罗万象，但可以像她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布鲁姆斯伯里》中所暗示的，找到那些知名人物之外的“更全面、也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再现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与活力。^②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1858年伦敦酷暑》的微观视域使文学史具有了“陌生化”的效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玲

① Anne Somerset, “The Heat Is On”, in *Literary Review*, July 2017, p. 29.

② Rosemary Ashton, *Victorian Bloomsbury*,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10.